

城市管理不能任由个别人“拍脑门”

本报评论员 吴迪



绿，酿成了巨额债务苦果——237家企业工程款未结清，合同总金额逾30亿元，约相当于当地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5%。在没有相关可行性研究及科学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大规模种植100多株云杉，部分绿化合同宽松、项目随意上马，“手指种树”“木桶种树”等怪象频出。

推进城市绿化，各地都在积极行动。令人不解的是，在城市绿化、招商合作等方面已有较成熟经验、较完善程序的当下，如此绿化项目随意上马，“透支”造绿而酿成巨额债务苦果，如此低级、儿戏的决策，究竟是怎么出炉的？

这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权力不受约束甚至“一言堂”的情形。全城造绿不是小事，云杉等树种是否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栽多少合适，都需要科学论证。可“领导一比画，这一片就都得种树”，取代了必要的论证与规划程序，正如点赞数最多的网友留言，“这是当地政府盲目、草率决策画出了红线，决策者‘拍屁股走人’不再容易，也为倒查和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拍脑门”决策，“透支”造绿，带来的危害不仅是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留下难以化解的债务风险，还消弭着公众对基层政府及其治理能力的信心，透支地方政府的形象——一个绿化领域便如此“阴晴不定”，更多公共治理领域又会如何呢？

此外，当地政府部门拖欠数百家企业工程款，导致不少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难以维继，这对其他投资者来说无疑有唇亡齿寒的担忧，当地营商环境难免遭受伤害。这也与国务院要求“抓紧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背道而驰。

这种“脑门一拍”，制度、政策、规划等统统失效的怪相，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希望这一事件能够警示更多地方的决策者，慎用手中的权力，让各项重大决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民心的检验。



斯涵涵

近期，根据湖北武汉市实际情况和疫情防控工作需要，18岁以上人群均可通过电话、现场或线上预约，按照约定时间完成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但我身边的不少武汉市民仍在观望。

十几天前，武汉市刚宣布开始全面普及新冠疫苗时，我便第一时间完成了接种。然而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亲友时，对方却问：“为什么要打疫苗？武汉市和我们国家很安全啊。”后来才发现，不少人都有类似想法。

媒体上，钟南山、张文宏等许多专家多次呼吁尽早接种，但不少人仍存在“疫苗犹豫”，对接种有所抵触，延迟或者拒绝接种。有些人认为接种疫苗并不重要、不紧急；有人担心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影响正常生活；有人认为新冠病毒“十分狡猾”，疫苗的保护作用不大；有人认为做好日常个人防护即可；还有人指望他人都去接种，以此建立起免疫屏障，自己便无须接种；更有极少数人对疫苗安全不信任而拒绝接种。

回望历史，从数百年前疫苗诞生时开始，反对疫苗的声音便一直存在。尤其在1998年发生于英国的“麻腮风疫苗事件”后，不少家长纷纷拒绝给孩子接种麻腮风疫苗。2019年，全球40个国家暴发麻疹疫情，导致大量无辜生命伤亡。同年，世卫组织官网列出全球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疫苗犹豫”名列其中，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信息误导、自满情绪、怀疑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接种便利程度或费用等。

时下，我国连续多日无本土新增病例，防疫形势向好，这容易使公众对疫情防控的长期性有所忽视。实际上，在人员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减少人员流动只能是短时间内的应急之举。未来，恢复流动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彼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疫情输入和局部流行风险依然存在，不接种疫苗既会增加个人健康风险，也可能造成人群免疫屏障不够坚固。

事实已经证明，疫苗接种是目前为止预防、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接种新冠疫苗能够降低感染率、重症率和病死率，是尽早建立免疫屏障的有效手段。

多一些了解，才能多一些理解。一些公众存在“疫苗犹豫”，更多的是源于对疫苗了解不多、认识不足。要疏解这种犹豫情绪，一方面要加强对疫苗研发投产流程和疫苗免费、快捷、安全等特点的宣传，以澄清谬误、传递信心。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接种过程中，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疫苗可及性、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等，提升公众对接种的好感度。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这几天，这样一条自带背景音乐的标语条幅在网上刷了屏。网友调侃“世界需要段子手”的同时，内心也少了几分对接种新冠疫苗的恐慌和不安。可见，树立“拒绝疫苗犹豫，我接种，我健康”的社会风尚，也可以用如此轻松、诙谐的方式。

小小一针疫苗，不仅在个体身上筑起了一道防线，还保护了成千上万因各种原因不能打疫苗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疫苗也是公民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自觉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成为保护他人、奉献社会的“志愿者”——期待更多人早日告别“疫苗犹豫”，用众志成城构筑起坚固的免疫屏障。

让山寨学科竞赛“见见光”

张西流

近日，有家长向央广反映，孩子参加了一项“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多个“渠道商”承诺，只要花一万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该比赛北京赛区一、二等奖，从而帮助孩子“小升初”加分。

以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命名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从2003年起举办，不少考生因在该比赛中获奖而被大学自主招录。但上述“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由某教育机构主办，是几经更名后的山寨货。

此前因多个获奖作品受质疑，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引发热议。教育部因此要求中小学生竞赛要全面自查，坚决防止参赛造假行为，并明确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如此背景下，山寨“叶圣陶杯”作文比赛万元可买奖，表明一些非法组织和人员仍在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割韭菜”，有关部门必须予以重视并查处。

过去，一些培训机构恣意夸大学科竞赛在升学中的作用，导致“学科竞赛热”失去理性。学科竞赛本来是开阔学生思路、培养学科兴趣、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的“好经”，但在功利诱惑之下被念歪了。学科竞赛本应属于“大众运动”，却变成了“大众项目”，以“奥数”为甚。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或需要学习“奥数”，但因其在择校、升学加分方面的特殊作用，很多学生学习“奥数”，参加“奥数”竞赛的动机变得功利起来。

近年来，多方都致力于对各种竞赛进行管理和规范，比如，2019年、2020年，教育部分别发布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只有30余项全国竞赛进入“白名单”。此外，严禁“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明确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严禁择校；规范和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取消奥赛和部分科技类竞赛国内获奖生保送大学的资格，等等。

如今，山寨“叶圣陶杯”考验着竞赛管理的韧性。国家层面应做好顶层设计，出台更多公平公正的政策，引导和规范学科竞赛朝着有利于教育事业、人才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同时，应加强对竞赛管理政策的宣传，引导中小学师生和家长主动抵制违规竞赛活动，发现线索及时投诉举报。特别是，要通过出台有效措施、改变竞赛奖励机制等，净化竞赛环境，弱化功利诱惑，将竞赛的舞台还给那些真正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这才符合义务教育和学科竞赛的初衷。

清理“沉睡”的银行卡，不宜“一刀切”

弓长

据3月29日《工人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多家银行对“沉睡卡”进行了集中大清理。但由于各家银行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处置手段也有所不同，银行卡余额被清零、交易记录消失、注销前通知不到户主本人等问题频频出现，用户的诸多担忧亟待银行方面回应。

不少人都持有多张银行卡，而不是所有银行卡使用频率都很高，甚至有人办好卡以后压根就未使用过。据央行披露，截至2020年9月末，我国共开立个人银行账户120.92亿户，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达8.64户。大量的沉睡账户不仅造成了金融账户资源的浪费，成为银行内部风险点、增加银行的运维成本，而且会给个人资产、信用带来风险，如小额账户被收取管理费、闲置银行卡被不法分子窃取利用等。

此种语境下，银行清理“沉睡卡”显然有必要性，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银行的处理方式值得商榷。比如有的银行在清理之前未以合理的方式通知客户，多数客户对于“被清理”毫不知情，假设双方之间的开户协议对该事项没有明确约定，那么银行单方面便有增加自身权利、减少自身义务的违约之嫌。再如，清零客户账户里的余额、交易记录有违银行自身功能定位——正是由于银行高度的风险防范能力、信用兑现能力，公众才对银行更信赖，如今客户的余额说清零就清零，显然不合适。

银行不能把本应自己承担的成本和责任转嫁给客户，而且事后清理治标不治本。“沉睡卡”的出现，实际上提示银行对自身业务流程、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要对症下药，从源头上减少“沉睡”的可能。

“沉睡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一些客户自身用卡需求的变化导致的，如不同工作单位对于工资卡指定的银行不同，各类生活缴

费业务也往往对应不同的商业银行等；另一方面与银行自身有很大关系，比如，银行为了吸储无节制鼓励客户多办卡，客户办理不同业务要绑定不同银行的银行卡，同行异地存取要收手续费，因而只能被迫办理本地卡，等等。

此外，不同银行业务之间存在壁垒，客户要想办理相关业务则必须办理该银行的银行卡，虽然已经有了银联作为跨行交易结算中介，但对于基本结算之外的其他类型业务的互通办理，目前尚无更好的解决对策，这也是不少人更习惯将银行卡绑定聚合型第三方支付工具的重要原因。

打蛇打七寸，治理“沉睡卡”确有必要，但把对银行业务的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才是解决之道。比如，有人认为，可以比照手机号携号转网的办法，银行卡同样可以携卡转开户地；有人建议，完善客户自助注销银行卡的流程，减少银行和客户双方的工作量。总之，办法应该比困难多。

室都没有，甚至连附属医院都没有。有些医学院学生只能靠图谱、幻灯片学习，还美其名曰“3D教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教育家巴德年坚决反对盲目创办医学院：“试问，那些盲目创办医学院的高校管理者们，你们生病的时候敢让你培养的医学毕业生给你开刀、插管、麻醉、做介入吗？你们都不愿意的话，那这些未来步入医生行列的毕业生还怎么能保障百姓健康？”

建设健康中国，医学教育是基础一环。规范医学教育，也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合格、优秀的医学人才，进而服务于健康中国。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医学教育摆在关系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对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指导。未来，加强医学学科建设、优化医学人才结构的同时，更要对“建医学院热”进行纠偏，不能盲目贪多求快而忽视质量。

医学院建设不能贪多求快

校大都已建立或正在筹建医学院、医学与健康学院，或与之有关联的生命学院、医学与健康研究院、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不少理工科、文科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也都有开设医学专业的冲动。

别让乱办医学院坏了医学教育的“一锅饭”，提升医学教育能级，并不意味着每所大学都要去“凑个”医学院。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已有20多年历史，还请两院院士担任首任院长，但在教育部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该学院只有基础医学、药学、生物学3个学科获评A+，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仅分获A、A-。清华大学尚且如此，那些拼凑起来的医学院的实力和水平，可想而知。医学教育，需要根

据医学教育资源情况设置医学院校并确定招生量，盲目建医学院、扩大招生规模，必然影响教育质量。

不同于一些传统学科，医学讲究实践操作，办一所医学院不仅离不开相关师资，也需要深厚的积累、沉淀。不少“拼凑”“合并”而来的医学院，仅仅是“体能”变大了，师资力量、医学文献、教学设备、实验室等均未解决。而医学专业学生不仅需要长时间进入科室临床学习，还要在不同科室轮转实习。这不仅需要高校建立自身的临床医学教育体系，还需要一批高水平的临床医生组建高水平的教学医院。而事实上，一些医学院连解剖学教研室、病理学教研

用『一起苗苗苗』构筑免疫屏障